

字以通神

——有關史前漢字的宗教性因素考察

Communicating the Divine through Character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igious Factors in Prehistoric Chinese Characters

陶曲勇

TAO Quyong

作者簡介

陶曲勇，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TAO Quyong,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taoquyong@126.com

Abstract

Unearthed artifacts of sacrificial vessels suggest that a Chinese religious consciousness can be found as early as the late Paleolithic Age, whil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Neolithic Age, a large number of carved symbols have been unearthed in the ruins of historic sites in China. These carved symbols appear to be closely tied t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suggest a possible origin for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carved symbols discovered at different sites, including Wuyang Jiahu (the earliest), Banpo (at the heart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Liangzhu (on the mar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long the Changjiang River) and proposes that these carved symbols imply a rich variety of religious elements. Based on this discove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religious elements might be a key force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a finding that demands we rethink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Keywords: prehistorical Chinese characters, carved characters, religion, unearthed artifacts,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所謂“史前漢字”，是指成熟的漢字體系出現之前，在中國境內出土的各種與漢字有密切聯繫的刻畫符號，也有學者稱之為“原始文字”（proto-writing）。^①一般認為，成熟的漢字體系開始於殷商甲骨文。從時代來看，甲骨文字系統屬於殷商晚期，可是在此之前，中國境內還出土了許多刻畫在陶器或玉石器上的幾何形符號和象形符號。它們應該如何釋讀？背後隱藏着什麼文化因素？它們與漢字的關係如何？這一直是漢字起源研究的一個熱門話題，本文嘗試探討這些史前漢字背後隱含的宗教因素，為漢字起源研究提供一些新的線索。

—

人類的宗教意識起源很早，羅伯特·路威（Robert Heinrich Lowie）說：“黑猩猩沒有宗教；一切初民部族全有宗教。”^②考古資料中所體現的原始宗教意識至少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考古學家曾經考察了從英國到前蘇聯的二十七座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墓葬遺址，發現有十七座墓葬中存在赭石遺存，這十七座墓葬使用的赭石，大致有兩種情況：第一，基底鋪赭石，或把基底塗成紅色。第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西周金文字詞、字際關係研究》（項目批准號：16XNQ015）的階段性成果。[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project “Research on Relation of Characters and Inter-Characters of Western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Fun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oject No.:16XNQ015).]

^①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1頁。

[QIU XiguI, *Philology Summar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3), 1.]

^② 羅伯特·路威：《文明與野蠻》，呂叔湘譯，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第215頁。[R. H. Lowie, *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trans. LV Shuxiang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1986), 215.]

二，以赭石粉塗抹屍體，或撒於屍體四周。^① 這些有意識的安排，顯然是原始宗教意識的最初表現。

中國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山頂洞遺址，是中國迄今所發現的最早的墓葬。負責發掘山頂洞遺址的考古學家裴文中說：“山頂洞人還用赤鐵礦做紅色的染料，將裝飾品染成紅色。屍體旁邊的土石上，也撒上赤鐵礦粉末，染成紅色。”^② 對於這種現象，不少學者用血液、靈魂和重新獲得生命來解讀。在屍體四周撒赤鐵礦粉末的葬法，是當時人認為紅色可能是鮮血的象徵，是生命的來源和靈魂的寄生處；屍體上及周圍撒上紅色的赤鐵礦粉末，是希望死者在另外的世界中復活。後來出土的殷墟甲骨卜辭中，還有在甲骨上“塗朱”的現象，盛行於武丁一代。有學者認為這只是為了美觀，但更多學者認為這應該是出於某種宗教意識或祭祀的需要；從早期墓葬形式的特點來看，結合殷商甲骨用於祭祀佔卜的特徵，顯然後一種說法更為可信，而且這種行為應該起源極早。

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文化所發現的墓葬已經有集中的墓地，從墓坑的方向、葬式到隨葬品的種類和組合，都有着一定的規律，甚至還出現了大小墓的區別，隨葬品也多寡不等。石器有斧、鏟、鐮、磨盤、磨棒，陶器有鼎、壺、罐、三足器等，均為實用品。陪葬品為實用品說明埋葬者認為人死後在另一世界還繼續存在，過着同現實世界一樣的生活，會繼續使用這些器物。^③

同屬新石器時代，但是時間稍晚的仰韶文化半坡遺址中已經有

^① 馬昌儀：《中國靈魂信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0-11頁。[MA Changyi, *On Chinese Beliefs in Souls* (Shanghai: Shanghai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10-11.]

^② 裴文中：《中國石器時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年，第35頁。[PEI Wenzhong, *Chinese Anthropolithic Age*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1954), 35.]

^③ 李友謀：《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載《考古》1979年第3期，第197-205頁。[LI Youmou, “Brief Report on the 1978 Excavation of Peiligang Ruins,” *Chinese Archaeology*. no.3(1979):197-205.]

氏族的公共墓地，共發現成人墓葬174座，小孩墓葬73座，其中小孩盛行甕棺葬，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葬具的盆、鉢底部往往有意鑿出小孔，整理者認為這些小孔與當時的靈魂觀念有關，是死者靈魂出入的通道。^①

江林昌指出：“在古代中國，原始宗教不僅催化了文明的起源，還促進了早期文明的發展。”^② 而文字與文明的密切關係則是大家所熟知的。英國學者格林·丹尼爾（Glyn Daniel）在他的著作《最初的文明》（*The First Civilizations*）中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條考古學標準：第一條是城市，要有五千人以上的居民；第二條是文字；第三條是大型禮儀性建築。後來，中國、日本等亞洲學者又提出應將“青銅器”也作為標準之一。^③ 但無論是東方學者還是西方學者，雙方都同意，文字是判斷文明起源的重要標準之一。

原始宗教和文字不僅構成了早期文明的重要內涵，而且還存在互相影響的可能。張光直就曾明確提出，中國文明的起源，其關鍵是政治權威的興起與發展。而政治權力的取得，主要依靠道德、宗教、壟斷稀有資源等手段，其中最重要的是對天地人神溝通手段的獨佔。上天和祖先是知識和權力的源泉。天地之間的溝通，必須以特定的人物和工具為中介，這就是巫師與巫術。統治者只要掌握了這二者，以及附屬於他們的藝術、文字等物事，就佔有了與上天和祖先的交通，也就取得了政治的權威。可見，三代的統治帶有強烈的巫術色彩，這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即中國古代文明是所謂薩滿式的文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213頁。[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Shanxi Xi'an Banpo Museum, *Xi'an Banp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63), 213.]

^② 江林昌：《論原始宗教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發展的影響》，載《東岳論叢》，2010年第10期，第47頁。[JIANG Linchang, "The Influence of Primitive Relig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Dongyue Tribune*, no.10(2010):47.]

^③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頁。[XIA Nai,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81.]

明。^① 張光直認為，古代中國文字的形式本身便具有內在的力量，這種力量來源於它同知識的聯繫；而知識卻來自祖先，生者須借助於文字與祖先溝通。這就是說，知識由死者所掌握，死者的智慧則通過文字的媒介而顯示於後人。^② 在張氏看來，文字本是宗教的一種手段，是統治者的一種工具。

二

從具體的史前漢字分析來看，大部分典型的刻畫符號，都隱含着豐富的宗教性因素，我們依據時間順序和不同地域選取最重要的幾個典型略作闡述。

1. 舞陽賈湖刻符

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史前漢字出土於新石器時代的河南舞陽賈湖遺址。1983-1987年，在河南省漯河市舞陽縣賈湖村發掘的裴李崗文化聚落遺址中，共出土了16例刻畫符號，分別刻畫於14件甲、骨、陶、石器上，個別符號和後來的殷商甲骨文字有相似之處（參看圖1）。經碳十四測定，遺址的考古年代約為7000-8000年範圍以內，若按樹輪校正數據則在7500-8500年之間。^③ 李學勤指出：“舞陽賈湖龜甲契刻符號不僅是目前我們中國發現的最早的人工刻畫符號。同時，根據我的知識來說，也是全世界最早的。跟這個可以比的只有兩河流域的一種算籌，英語叫token，就是一定形狀的小泥塊，計算用。它的時代沒有字的跟舞陽賈湖差不多，從有原始文字符號的來說，還要晚一點。現在我們看到的人類有意識的刻畫符號就能達到這種程

^①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3頁。
[ZHANG Guangzhi, *Art, Myth and Ritual*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88), 1-3.]

^②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第71頁。

^③ 馮沂：《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載《文物》，1989年第1期，第1-14頁。[FENG YI, “Brief Report of the 2nd to 6th Excavations on Jiahu Neolithic Ruins at Wuya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1(1989):1-14.]

度。埃及的晚多了。目前的埃及的刻畫符號在公元前四千年上下，主要出土於尼羅河上游。”^①

賈湖遺址的刻畫符號蘊含着豐富的宗教性因素。從刻畫載體來看，16例刻畫符號中，龜甲和骨器佔據絕大部分，而用動物骨骼佔卜的風俗，在我國由來已久。如《史記·龜策列傳》記載說：“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又曰：“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作為中國最早的成熟的漢字體系——殷商甲骨文就是刻寫在龜甲和獸骨上，是佔卜祭祀等宗教活動的最直接產物，而賈湖刻畫符號恰好也是刻畫在龜甲和骨器上，兩者應該不是簡單的偶然巧合。

從墓葬情況來看，出土刻畫符號的M344的墓主人是一位壯年男性，墓中隨葬有陶、石、骨、牙器20餘件，其中有一件叉形骨器，另有8個完整龜甲，報告整理者認為隨葬的叉形骨器和龜殼堆在一起，作為巫術法器的可能性極大，墓主應為酋長兼巫師。M330的墓主是一位老年婦女，隨葬的柄形石器上刻有一組符號，而不是常見的單個符號，報告整理者認為墓主也應該是一位巫師，柄形石器可能是法器，上面的刻符或許是咒符或者圖騰。^②

值得注意的是，與這些刻畫符號一起出土的還有十支骨制管樂器骨笛，這些骨笛都是用禽類的骨管制成，長約20釐米，直徑約1.17釐米，大多為七孔，形制固定，製作規範，具備七音階結構。^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音樂水平、測量技術、鑽孔工藝等都已經相當成

^① 李學勤：《中國文字從起源到形成和書法同時產生》，載《中國書法》，2001年第10期，第4-10頁。[LI Xueqin, “Chinese Characters Came into Being at the Same Time as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Calligraphy*, no.10(2001):4-10.]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第988-999頁。[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uyang Jiahu* (Beijing: Science Press.1999), 988-999.]

^③ 黃翔鵬：《舞陽賈湖骨笛的測音研究》，載《文物》，1989年第1期，第15-17頁。[HUANG Xiangpeng, “Study on Measuring the Sound of Wuyang Jiahu Bone Flut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1(1989): 15-17.]

熟，文明水平可見一斑。而音樂與宗教的聯繫又是大家所熟知的，一般認為，在整個人類文化體系中，與音樂關係最為密切的就是宗教，還有學者指出，音樂的起源就是為了人與超自然界的溝通而形成的，所以巫師墓葬的遺址中出土了可以用於宗教活動的骨笛，這是順理成章的。賈湖的刻畫符號和用於宗教活動的骨笛，均出土於巫師的墓葬，又刻畫於龜甲和獸骨上，其蘊含的宗教因素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2. 半坡陶符與安諾石印

在賈湖刻符出土之前，有關史前漢字的研究焦點是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出土的陶符。1954-1957年，考古工作者在陝西省西安半坡遺址發掘了大量的刻畫符號，主要刻畫在飾有寬帶紋或大的垂三角形紋直口鉢的外口緣。這些符號多出土於同一窖穴，整理者推測其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製造者的專門記號。整理者認為，這些符號均是人們有意識刻畫的，代表一定的意義，是當時人們對某種事物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很可能是中國古代文字原始形態之一。^①

半坡陶符公佈以後，立刻引起研究者的濃厚興趣，許多學者認為半坡陶符就是文字，但也有許多學者持反對意見。直至今日，這種討論仍然沒有取得共識。

2000年6月，美國學者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希伯爾特(F.T.Hiebert)博士在土庫曼斯坦的安諾遺址發現了一枚石印，材質是有光澤的黑玉(black jet)，印面刻有符號(參看圖3)，可以與半坡陶符及相關材料進行對比，為學者重新認識半坡陶符提供了新的視角。

據發掘者介紹，石印出土於安諾遺址的一個房間內，印背有橫置圓柱形鈕，印面正方邊長約1.3-1.4釐米，印面所刻符號的筆畫中還有紅黃色顏料，雕刻精美。通過對比石印共存的碳測定，年代約為公元前2300年左右，也就是距今4000多年。

^①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第196-198頁。

李學勤先生細緻地分析了安諾石印的符號，指出它們可以分解為5個不同的符號，可以和半坡陶符、姜寨陶符、柳灣陶符對照（參看圖4、圖5），李先生很謹慎地提出：“我並不以為石印和仰韶等文化有什麼直接聯繫，只是想指出：石印的出現，表明印面上這一類由直綫筆劃構成的符號是可以作為文字使用的。”“這對於我們如何看待中國的陶器符號，無疑是有一定啟發的。”^① 而何靖先生則認為，安諾石印就是古代中國貿易商使用的印章。何靖先生指出，古代中國很早就與印度河流域有着直接的貿易聯繫，兩個文明之間存在互相交流和影響的可能性，而現有材料又可以證明印度河文明與科佩特山麓一帶的青銅時代的納馬茲加文化的關係，所以可以推測安諾石印是古代中國的貿易商留於安諾之物，印章上面的文字是古代中國早已出現的符號。^②

在李、何兩位先生的基礎上，我們想進一步指出的是，安諾石印如果確實可以與半坡陶符等聯繫起來，那麼這不僅可以證明半坡陶符可能屬於文字，而且還意味着這些符號可能具備一定的宗教色彩。

這要從中國印章的起源說起。迄今為止，中國考古發掘出土最古老的印章，是1998年在安陽殷墟出土的一枚青銅印章，該印章上裝飾有獸面紋，一些研究者定為饗饗紋；2009年和2010年又分別在殷墟出土了另外兩枚青銅印章，其中一枚印章上裝飾有夔龍紋。^③ 殷墟出土的器物上，饗饗、肥遺、夔龍和虬等動物圖案比較常見，傅斯年曾經指出，青銅禮器上雕飾動物是協助巫覡通民神、通天地的一種方

^① 李學勤：《安諾石印的啟發》，載《中國書法》，2001年第10期，第11-13頁。[LI Xueqin, "Some Inspiration from Anau Lithography," *Chinese Calligraphy*, no.10 (2001): 11-13.]

^② 何靖：《中國文字起源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第566-581頁。[HE Zheng,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engdu: Ba Shu Press, 2011), 566-581.]

^③ 何毓靈、岳佔偉：《論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銅印章及相關問題》，載《考古》，2012年第12期，第70-77頁。[HE yuling & YUE zhanwei, "On the Three Bronze Seals Unearthed in Yin Ruins and Related Issues," *Chinese Archaeology*, no.12(2012):70-77.]

式。^① 張光直也持有同樣的觀點。^② 這些造型和紋飾蘊含有宗教巫術寓意，可能跟祭禮的具體用途密不可分，所以有學者提出，中國印章的起源和宗教祭祀巫術有關。^③

表面上，文字似乎只記錄語言，但一直以來，中國人認為文字魘鎮鬼神的力量比語言還要強大。從現有材料來看，中國的漢字產生以後，就被大量用於巫術宗教活動之中。例如商代甲骨文是一種祭祀佔卜後的遺存，春秋時期使用文字盟誓，戰國時期出現了物疏、告地書，漢代還有模仿人間帝王使用的“丹書鐵券”，用於寫作給鬼神的文書。西漢《居延漢簡》49.3有這樣的記載：“魘魅書，家長以制日疏魅名。魅名為天牧，鬼之精，即滅亡。有敢苛者，反受其央（殃），以除為之。”《說文·鬼部》：“魅，厲鬼也。從鬼，失聲。”可見當時人認為，將厲鬼的名字寫在紙上就可以魘鎮災禍。所以西漢的《淮南子·本經訓》在提到倉頡造字時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注曰：“鬼恐為書文所駭，故夜哭也。”^④

起源於祭祀巫術的印章和具備神秘力量的文字結合在一起，就成了後世宗教中常見的一種法器。至少從東漢開始，圖章就已經正式成為巫師道士禁駭鬼神的法器。葛洪《抱朴子·登涉》記載說：“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

^① 傅斯年：《跋陳盤君〈春秋公矢魚於棠說〉》，載《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6-279頁。[FU Sinian, “Postscript for Chen pan ‘Historical Book-Gong shi yu yu tang shuo’,” in *Collected Papers of FU Sinian(III)*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276-279.]

^②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435頁。[ZHANG Guangzhi, *Bronze Age in China*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1999), 435.]

^③ 潘振中：《試論我國印章起源於宗教》，載《中國文物報》，1988年7月22日。[PAN Zhenzhong, “On the Seals Begin with Religion in China,” *China Cultural Relic News*, July 22, 1988.]

^④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571頁。[HE Ning, *The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Huainan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571.]

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福禍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① 半坡陶符以及同屬仰韶文化的姜寨陶符等，既然可以用於早期印章，那麼它們本身含有巫術宗教因素也就可以理解了。

3. 大汶口文化陶符和良渚文化符號的對比

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發掘的山東省泰安縣大汶口遺址而得名，其絕對年代在公元前4200年-公元前2600年。從1959年到1979年，考古工作者陸續在大汶口文化的各處遺址發現了多個刻畫符號，其中有些刻畫符號還塗有紅色顏料，顯然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

這些符號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種組合型的刻符（參看圖6），於省吾認為其上部像日形，中間的部分像雲氣形，下部像五峰形，“山上的雲氣承托着初出的太陽，其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繪。因此我以為，這是原始的旦字”。^② 唐蘭則釋其為“炅”字：“上面刻畫着太陽，太陽下面畫出了火，下面是山，而另一個字卻只在日下畫出了火形，把山形省略，因此，跟後來的‘炅’字完全一樣。”並認為當時“已經有簡體字，說明它們已經是很進步的文字”。^③ 田昌五則根據唐蘭關於大汶口文化屬於少昊文化的說法，認為這兩個刻符“其意應是太皞和少皞之皞字，有如銅器上的族徽”。^④

^①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13頁。[WANG Ming, *The Annotate of Baopuzi*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313.]

^② 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35頁。[YU Xingwu, “Some Problems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2(1973): 32-35.]

^③ 唐蘭：《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載《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6頁。[TANG La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Sites and Characters Wucheng Culture in Jiangxi Provinc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7(1975): 72-76.]

^④ 田昌五：《古代社會斷代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頁。[TIAN Changwu, *New Draft of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Society* (Beijing: The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 53.]

在傳世的良渚文化的器物上，也發現了和大汶口陶符相類似的符號。如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有3件玉璧，上面刻有一只鳥立於盾狀的五峰山上，山體上刻有太陽紋，日本學者林巳奈夫認為這盾狀的五峰山與大汶口文化符號下部的五峰山有關係。^① 還有學者把這盾狀五峰山視作是表示祭壇的台形圖案。^②

良渚文化的年代為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因首先發現於浙江省餘杭縣良渚而得名，從出土的玉器、陶器的形制、紋飾等方面來看，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存在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的現象。

我們認為，上述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兩種刻畫符號應該聯繫起來加以考察，它們其實反映了上古時代，位於東方的東夷文化對太陽和神鳥的崇拜。從王國維、傅斯年到徐旭生，學術界認為，古代中國部族的分野，大致可以劃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這三大集團互相鬥爭，後又和平共處，終於完全同化，漸次形成後來的漢族。^③ 無論是大汶口還是良渚，都屬於東夷文化，在東夷文化中，對太陽和與之有關的神鳥崇拜，是比較常見的一個主題。

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太陽的象徵物叫做“金烏”或是“三足鳥”。這種說法已被考古發掘所證明，如華縣泉護村仰韶文化H165中出土的彩陶片上有“金烏負日圖”，南陽漢畫像石上亦有同樣的圖案。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上，金烏立於太陽中，即“日中有踰烏”也。^④ 類

^① 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圖像記號》，載《東南文化》，1990年第3、4期合刊，第154-163頁。[Hayashi Minao, “Image Mark in Liangzhu Culture and Dawenkou Culture,” *Southeast Culture*, no.3/4(1990): 154-163.]

^② 劉斌：《良渚文化的冠狀飾與耘田器》，《文物》1997年第7期，第20-27頁。[LIU Bin, “Crown-shaped Ornaments and Cultivation for the Field of Liangzhu Cultur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7(1997), 20-27.]

^③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頁。[XU Xusheng, *Legend Era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5.]

^④ 杜金鵬：《關於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幾個問題》，載《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5-923頁。[DU Jinpeng, “Problems on Dawenkou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Chinese Archaeology*, no.10 (1992), 915-923.]

似題材在漢墓壁畫、畫像石磚上屢見不鮮，“金烏負日”是古人對太陽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我們認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這兩個符號，表現的都是“金烏負日圖”，大汶口陶符的中間部分既不是雲氣，也不是火形，而是金烏的抽象輪廓（參看圖8），即神鳥背負太陽，從群山中升起。良渚玉璧上的圖案也是同樣的主題，只是順序略有不同，將鳥形居上，太陽置於盾狀的五峰山中而已。

大汶口文化的陶符見於陶尊上，這些陶尊有學者認為就是甕棺；在甕棺上刻畫“金烏負日”的符號，或許還蘊含着祈求死者的靈魂能逝而復生，像太陽東升西落，永不停歇。

三

從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甲骨文出現，從黃河流域、淮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在早期中國的各個文明遺址中都發現了刻畫符號。但令人遺憾的是，無論哪一處遺址的刻符，都會面臨是否屬於文字的爭論，雙方各持一詞，經歷幾十年的爭論而難以達成共識。

反對者最主要的依據是，已發現的各種刻畫符號都無法證明是確定的音義結合體，尤其是無法證明它們具備一定的讀音。這種主張的實質是19世紀以來結構主義語言學對語言和文字關係的認識，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系統”，相對於文字，語言才是第一性的，正如索緒爾所說：“語言和文字是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後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於表現前者。”^① 由此出發，單個的刻畫符號如果不能確定讀音和意義，自然不能算作文字；即使是成行排

^①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47頁。[F.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 GAO MingkaI, proofread by CEN Qixiang & YE Feish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0), 47.]

列的刻畫符號，也會面臨同樣的困境。

事實上，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文字的定義是對後世成熟的文字系統的一種概括，這個定義並不適合用來探討文字的起源。可以設想一下，當一批符號能夠證明屬於完整的音義結合體時，那麼這些符號顯然已經屬於成熟的文字了，絕不是從無到有的早期文字。用它去衡量那些文字起源階段的各類符號，必然扞格難通，所以李零先生認為：

“定義說是個要麼全無要麼全有的創世說，很像孫悟空出世，文字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① 而且，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文字的定義也不是唯一的真理，許多學者都對文字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如伊斯特林對文字的定義是：“它是有聲語言的補充性交際手段，這種手段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主要用來把言語傳到遠處，長久保持，並且借助圖形符號或形象來表現；通常這些符號或形象表達某種言語要素——一個個最簡單的信息、單詞、詞素、音節或音素。”^② 伊斯特林認為，文字同思維取得聯繫的基本類型不是只有“思維—語言—文字”，而是還有“思維—文字”這種模式，可以不用通過“語言”作為中介。^③ 王元鹿先生指出，許多西方學者未將文字與語言聯繫起來，正是由於他們認為原始文字“不能精確反映語言”，而是“直接反映意識的”。^④ 所以來國龍大聲呼籲，要擺脫“語言學眼光”的束縛，“更多運用考古學的方法，從考古發現的實物及其環境出發，重新審視舊材料，努力發掘新材料，開闊思路，多從具體的器物功能、社會機制等層面去討

^① 李零：《誰是倉頡——關於漢字起源問題的討論（上）》，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年1月17日。[Li Ling, “Who is Cangjie—Discussion on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rt 1, *Oriental Morning Post-Shanghai Book Reviews*, January 17, 2016.]

^② B.A. 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左少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頁。[B. A. Nctpnh,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trans. ZUO Shao 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9.]

^③ 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左少興譯，第10-17頁。

^④ 王元鹿：《普通文字學概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2頁。[WANG Yuanlu, *General Philology* (Guiyang: GuiZhou People Press, 1996), 20-22.]

論，以推進漢字起源的探索”^①。

文字的起源和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和特點。根據語言學通行的觀點，人類語言大約產生於10多萬年以前，而今天公認的人類最早的文字——西亞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最早也不過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為什麼人類語言產生以後的漫長時間內，都沒有產生文字？為什麼在全世界廣泛分佈的各個文明族群中，只有少數幾個文明孕育出了文字？這說明，隨着人類社會文明的進步，文字不是必然會產生的，一定是由於某種契機的促動，才導致文字的產生，有關楔形文字的起源研究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1992年，美國學者丹尼絲·史曼特·白斯拉特（Denise Schmandt-Besserat）出版了《文字之前（Before Writing）》（德克薩斯大學出版社）一書，認為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楔形文字是從記數的“陶籌”演變而來的。

根據白斯拉特的研究，楔形文字不是起源於圖畫，而是直接由三維的陶籌演變而來。具體說來，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初期，當地人就開始使用一種陶籌記事記數；到公元前4000年末，開始把陶籌包裹在空心泥球裏，同時在泥球表面上用圓印印上痕跡，以此表示所有權。但是，把陶籌放進空心泥球裏有一個難以克服的缺陷，那就是如果當事人忘記了泥球裏究竟存放了多少個、什麼樣的陶籌時，就只有打破已經封印好的泥球來重新計算。大概是為了克服這個缺陷，人們開始在封印泥球之前，就用陶籌在還未變幹的泥球表面壓印一次，這樣，從表面的印跡就可以知道裏面的陶籌數量和形狀，可以隨時複查。再進一步，人們發現，既然只要有印跡就可以起到記數記事的功能，那就不必保存陶籌了，於是空心泥球被實心泥板代替，開始出現

^① 來國龍：《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和漢字起源的考古學研究》，載《考古學研究（六）》，2006年，第54頁。[LAI Guolong,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aracters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Character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no.6(2006): 54.]

了只有陶籌印跡而無實際陶籌的泥板。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發現陶籌在泥板上壓出的痕跡常常不是十分清楚，又很佔面積，於是開始用蘆葦筆把陶籌畫在泥板上（參看圖9），至此，三維的陶籌演變成了二維的符號——楔形文字由此誕生了！^①

從白斯拉特的研究可以看出，從陶籌到陶印文字的產生，實質是同種功能的東西長期發展後在形式上的蛻變而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楔形文字是作為一種存儲媒介而不是記錄聲音的交流媒介而發明的，並不符合結構主義語言學對文字的定義。所以，因為無法確定史前刻畫符號是否表音，從而否定它們與文字的關係，這種看法是不可取的。

根據上文對中國史前刻畫符號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們共同的特點是蘊含着豐富的宗教因素，這很可能就是漢字起源中的關鍵性促進因素。這種推論和中國傳統的“倉頡造字說”也是十分吻合的。

“倉頡造字說”是中國歷史上有關文字起源的各種說法中影響最大的一種，最早見於戰國時代的文獻，如《呂氏春秋·君守》《韓非子·五蠹》等。

過去許多學者着眼於考證倉頡是否實有其人，大約生活在哪個時代，因為史料的缺乏，難以得出結論。事實上，“倉頡”不過是漢字發明者的代名詞，重點不在於找到倉頡這個人，而應該關注這個傳說背後所體現的歷史背景，正如王國維在《古史新證》中所說：“上古之事，傳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②“倉頡造字說”中最能體現史實之“素地”的莫過於倉頡的身份。從《周禮》到《說文》都

^① 拱玉書：《楔形文字起源新論》，載《世界歷史》，1997年第4期，第60-67頁。[GONG Yushu, “New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henogram,” *World History*, no.4(1997) 60-67.]

^②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頁。[WANG Guowei, *New Proof for Classic History*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提到，倉頡是黃帝時代的一名史官，這是很有價值的說法。

中國文化中，巫、史往往不分，二位一體，李澤厚曾經總結指出“理性化了的巫史傳統（Shamanism rationalized）”是中國文化的兩大特別重要的徵候之一。一方面“史”即是“巫”，是“巫”的承續，“祝史巫史皆巫也，而史亦巫也”；另一方面，“史”又是“巫”的理性化的新階段。^① 這種特點，反映在古籍中就是巫、史常常並稱，如《左傳·哀公九年》提道：“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佔諸史趙、史墨、史龜。”史官都是參與佔卜等宗教活動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自陳：“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司馬氏家族世代擔任史官，對該職業的認識，無疑是深有體會的。“倉頡造字說”將倉頡的身份定為史官，這恐怕不僅揭示了中國漢族早期文字的使用狀況，事實上也符合部分少數民族文字發明的實際情況，如彝族的畢摩發明了彝文，納西族的東巴發明了東巴文。

總之，不管是對考古遺址出土的刻畫符號的分析，還是對文字起源傳說的考證，或者是類比其他自源文字，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因素在漢字起源中佔據了重要地位。早期的巫史是怎樣使用這些刻畫符號，這些符號又是如何從用於溝通天地、交往神靈變為記錄世事、傳遞語言，如果能在以後的研究中弄清楚這些演變的過程，大概漢字的起源問題就可以得到徹底解決了。

^① 李澤厚：《說巫史傳統》，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第5-26頁。[LI Zehou, *Tradition of Shamanis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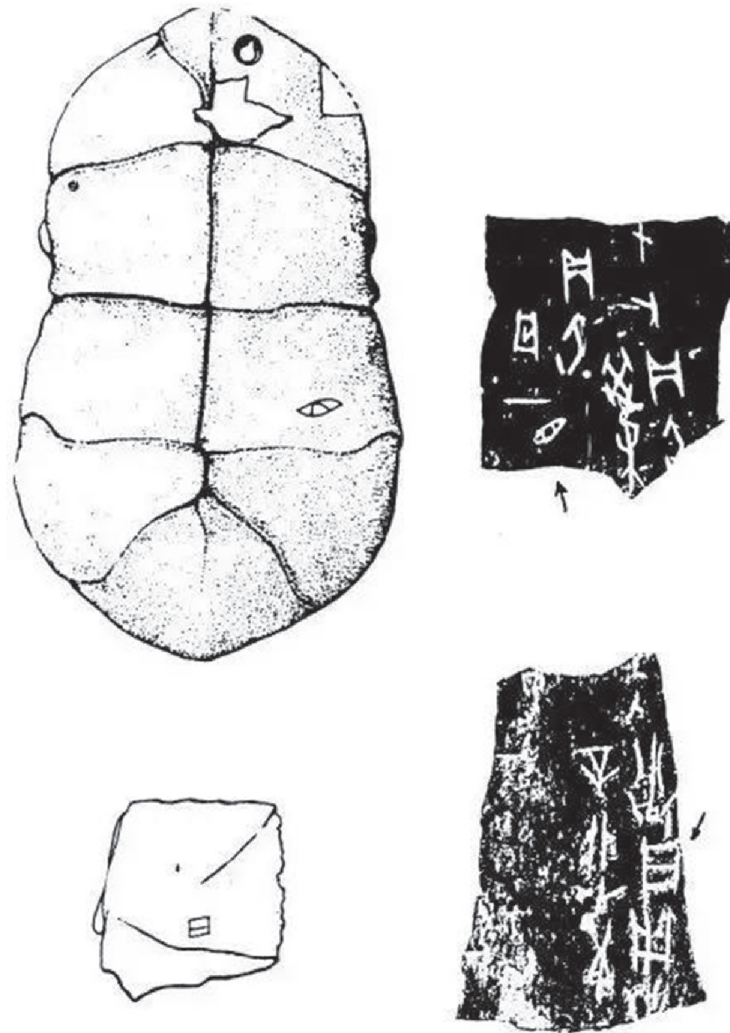


圖1：舞陽賈湖龜甲契刻符號（左）與殷墟甲骨文拓片（右）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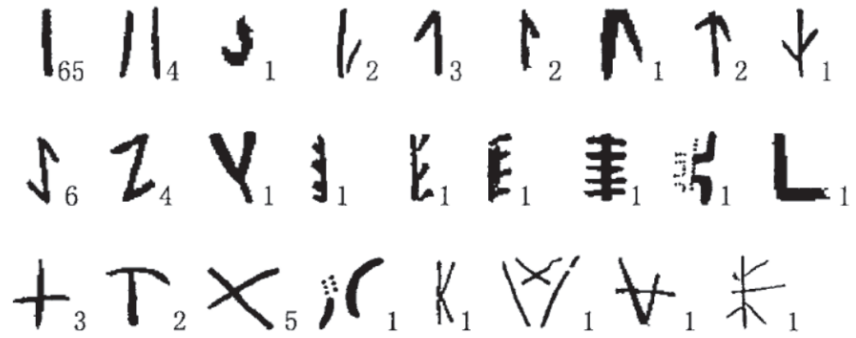


圖2：半坡遺址仰韶文化刻畫符號一覽表
（注：陶符右下角的數字代表該陶符出現的次數）



圖3：安諾石印



圖4：仰韶文化姜寨遺址出土彩陶刻畫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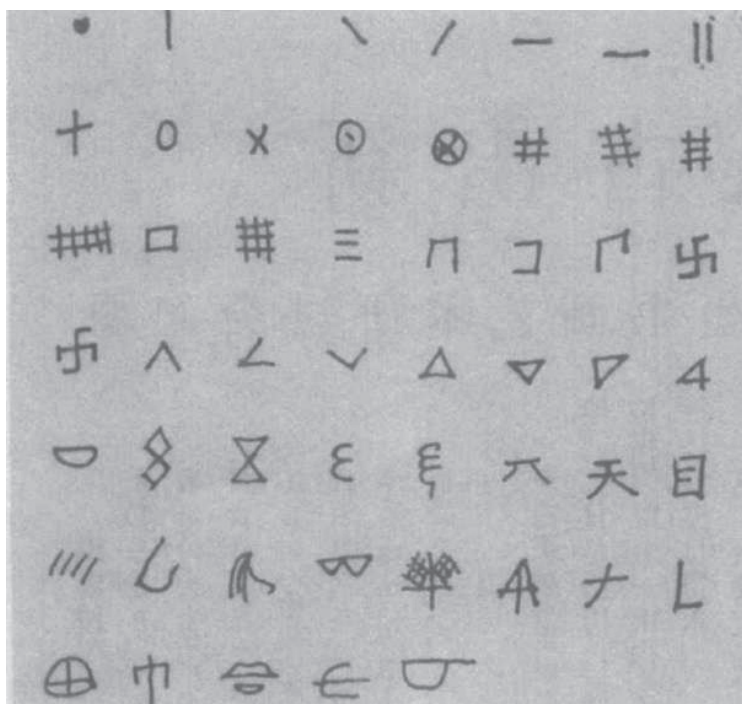


圖5：馬家窯文化柳灣彩陶刻畫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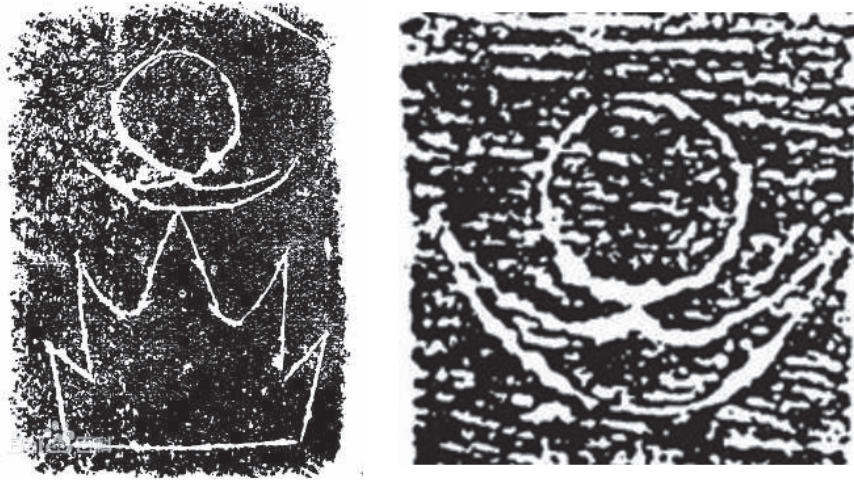


圖 6：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符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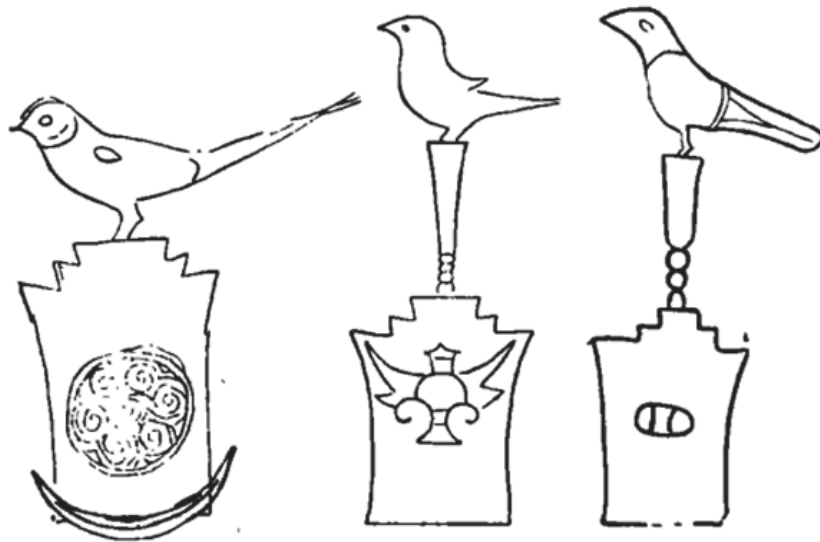


圖 7：美國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良渚文化玉璧刻畫符號



圖 8：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良渚文化玉鳥



圖 9：西亞美索不達米亞西元前 3200 年的泥板書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中文文獻[Works in Chinese]

- 杜金鵬：《關於大汶口文化與良渚文化的幾個問題》，載《考古》，1992年第10期，第915-923頁。[DU Jinpeng. "Some Issues Related to Dawenkou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Chinese Archaeology*, no.10 (1992): 915-923.]
- 馮沂：《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二至六次發掘簡報》，載《文物》，1989年第1期，第1-14頁。[FENG Yi. "Reports of the 2nd to the 6th Excavations on the Jiahua Neolithic Ruins in Wuyang County, Henan Provinc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1(1989):1-14.]
- 傅斯年：《跋陳盤君〈春秋公矢魚於棠說〉》，載《傅斯年全集》（第三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6-279頁。[FU Sinian. "Postscript for Chen pan 'Historical Book Gong shi yu yu tang shuo'." In *Collected Papers of FU Sinian (III)*, 276-279. Changsha: Hun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 拱玉書：《楔形文字起源新論》，載《世界歷史》，1997年第4期，第60-67頁。[GONG Yushu. "New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Sphenogram." *World History*, no.4(1997): 60-67.]
- 林巴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圖像記號》，載《東南文化》，1990年第3、4期合刊，第154-163頁。[Hayashi, Minao. "Imagery Marks in Liangzhu Culture and Dawenku Culture." *Southeast Culture*, no.3,4(1990): 154-163.]
-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Wuyang Jiahu*. Beijing: Science Press, 1999.]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HE Ning. *The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Huainanz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何毓靈、岳佔偉：《論殷墟出土的三枚青銅印章及相關問題》，載《考古》，2012年第12期，第70-77頁。[HE yuling & YUE zhanwei. "On the Three Bronze Seals Unearthed at Yin Ruins and Related Issues." *Chinese Archaeology*, no.12(2012): 70-77.]
- 何靖：《中國文字起源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HE Zheng. *Study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Chengdu: Ba Shu Press, 2011.]
- 黃翔鵬：《舞陽賈湖骨笛的測音研究》，載《文物》，1989年第1期，第15-17頁。[HUANG Xiangpeng. "Study on Measuring the Sound of Wuyangjiahu Boneflut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1(1989): 15-17.]

- 江林昌：《論原始宗教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發展的影響》，載《東岳論叢》，2010年第10期，第47-58頁。[JIANG Linchang. "The Influence of Primitive Relig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China." *Dongyue Tribune*, no.10(2010): 47-48.]
- 來國龍：《文字起源研究中的“語言學眼光”和漢字起源的考古學研究》，載《考古學研究》，2006年第6期，第53-78頁。[LAI Guolong.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Research on Origin of Characters and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on Origin of Characters."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Vol.6(2006): 53-78.]
- 李零：《誰是倉頡——關於漢字起源問題的討論（上）》，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年1月17日。[LI Ling. "Who is Cangjie—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rt.1. *Oriental Morning Post·Shanghai Book Reviews*, January 17, 2016.]
- 李學勤：《安諾石印的啟發》，載《中國書法》，2001年第10期，第11-13頁。[LI Xueqin. "Some Inspirations from ANAU Lithography." *Chinese Calligraphy*. no.10(2001): 11-13.]
- 李學勤：《中國文字從起源到形成和書法同時產生》，載《中國書法》，2001年第10期，第4-10頁。[LI Xueqin. "Chinese Characters Came into Being at the Same Time as *Chinese Calligraphy*." *Chinese Calligraphy*, no.10(2001): 4-10.]
- 李友謀：《裴李崗遺址一九七八年發掘簡報》，載《考古》，1979年第3期，第197-205頁。[LI Youmou. "The Brief Report on 1978 Excavation of Peiligang Ruins." *Chinese Archaeology*, no.3(1979): 197-205.]
- 李澤厚：《說巫史傳統》，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LI Zehou. *Tradition of Shamanism*.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劉斌：《良渚文化的冠狀飾與耘田器》，載《文物》，1997年第7期，第20-27頁。[LIU Bin. "Crown-shaped Ornaments and Cultivation Tool Excavated in Liangzhu Ruins."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7(1997): 20-27.]
- 羅伯特·路威著，呂叔湘譯：《文明與野蠻》，北京：三聯書店，1986年。[Lowie, Robert H. *Are We Civilized? 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LV Shuxi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1986.]
- 馬昌儀：《中國靈魂信仰》，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MA Changyi. *On Chinese Beliefs in Souls*. Shanghai: Shanghai Art and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8.]
- B. A. 伊斯特林：《文字的產生和發展》，左少興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Nctpnh, B. A.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s*. Translated by

- ZUO Shaox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 潘振中：《試論我國印章起源於宗教》，載《中國文物報》，1988年7月22日。
- [PAN Zhenzhong. "On the Seals Begin with Religion in China." *China Cultural Relic News*, July 22, 1988.]
- 裴文中：《中國石器時代》，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年。[PEI Wenzhong. *Chinese Anthropolithic Age*. Beijing: China Youth Press, 1954.]
-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QIU Xigui. *Philology Summary*.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3.]
- 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Saussure, Ferdinand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GAO Mingkai. Annotated by CEN Qixiang & YE Feisheng.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0.]
- 唐蘭：《關於江西吳城文化遺址與文字的初步探索》，載《文物》，1975年第7期，第72-76頁。[TANG Lan.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n the Sites and Characters Wucheng Culture in Jiangxi Province."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7 (1975): 72-76.]
- 田昌五：《古代社會斷代新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TIAN Changwu. *New Draft of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Society*. Beijing: Logical Anthropology, 1982.]
- 王國維：《古史新證》，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WANG Guowei. *New Proof for Classic History*.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王明：《抱朴子內篇校釋（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WANG Ming. *The Annotate of Baopuzi*.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 王元鹿：《普通文字學概論》，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WANG Yuanlu. *General Philology*. Guiyang: GuiZhou People Press, 1996.]
-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XIA Nai.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XU Xusheng. *Legend Era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China*.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於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載《文物》，1973年第2期，第32-35頁。[YU Xingwu. "Some Problems o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Wenwu: Cultural Relics*, no.2(1973): 32-35.]

- 張光直：《美術·神話與祭祀》，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ZHANG Guangzhi. *Art, Myth and Ritual*.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1988.]
- 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ZHANG Guangzhi. *Bronze Age in China*.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1999.]
-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Shanxi Xi'AN Ban po Museum. *Xi'an Banpo*.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1963.]